

RETRANSLATION STUDIES

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动因

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

高存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动因

——理论与研究与案例分析

高 存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动因：理论与案例分析 /
高存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310-05624-8

I. ①外… II. ①高…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翻译—
研究—中国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525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03 千字

定价：5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本书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动因研究: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项目编号:16YJC740017。

自序

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重译现象普遍存在。萧乾认为，“像这样世界公认的经典名著的翻译情况，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①。由此推及经典名著的重译，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同样是一国文化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据王向远、陈言统计，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之中，重译的译本数量占一半以上^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大范围的名著重译，曾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突出现象，例如《堂吉珂德》至少有杨绛译本、董燕生译本和刘京胜译本三个译本；《大卫·科波菲尔》《洛丽塔》《雪国》等作品分别至少有四五种译本，《红与黑》更是拥有不下十几种译本^③。

古往今来，文学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对重译价值的探讨从未停止，但重译具有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却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文洁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非常欢迎能够多出几个《尤利西斯》的译本，这部著作意象纷繁，多几种解释有助于研究。这与翻译家赵瑞蕪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曾说道，“名著不厌百回译。古今中外名著重译现象多得很，例子可举出不少。有了多种不同

① 萧乾：《尤利西斯·译序》，转引自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② 王向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③ 同上，第57-58页。

译本可以进行比较,评判优劣,对提高文学翻译水平极有好处”^①。重译的价值不单单体现在实际的文学翻译领域,在翻译理论的发展中,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国许多重要的传统译论与翻译主张更是直接由重译催生,或者在重译中受到启发而总结出来的。例如,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理论的形成,便与重译直接相关。这一重要理论的灵感源于他在研究般若过程中对同本异译的比较,而这里的同本异译,即我们所谓的对同一译本进行的重译。在对不同译本的逐一对照分析中,他发现了佛经翻译中的“删略”现象,并提出了关于“繁与简”“文与质”的见解,后来“参加译场工作,有了实际经验,又听了参与译事者的见解后,他的认知便日趋成熟”,终于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②。而玄奘“五不翻”原则的提出,似乎也无法脱离与重译的关系。玄奘在提出“五不翻”的原则之前,有着亲身重译的丰富经验,他对佛经以前旧有的译文,“凡错误艰涩,不易晓悟,或中间增损,多坠全言(有失原意)者,一一予以重译”,正是在长期翻译、对旧译本的仔细研究和自己的亲身重译中,才积累了丰富的感悟,集成了“五不翻”^③原则。在国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语期刊《重写本》(*Palimpsestes*)便以“重译”为主题,专门推出了一期特刊,证实了重译研究不可低估的价值,而该杂志于2004年再次推出“重译研究”专刊,2003年《札记》(*Cadernos*)杂志同样推出了一辑“重译研究”专刊,至此,不仅重译研究的价值在国外译界中毋庸置疑,而且还出现了重译研究的一次次高潮。^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的一句“重译是价

① 赵瑞蕻:《关于〈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②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③ 同上,第150页。

④ Outi Paloposki & Kaisa Koskinen, “Reprocessing Texts: The Fine Line between Retranslation and Revis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11, no. 1 (2010), pp. 29-49.

值的创造”^①，一语道出了重译研究无可估量的价值与巨大意义。重译现象在古今中外翻译史上频繁、持续地发生，重译研究的巨大价值、重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意义与广阔空间，正是笔者将其选定为研究课题的主要缘由。

高 存

2018年6月

^① 田传茂：《西方重译理论研究述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目 录

第一章 重译术语的演变与辨析	1
第一节 国内重译术语的演变与辨析	1
第二节 国外重译术语的演变与辨析	6
第三节 小结	8
第二章 重译动因研究的理论框架	9
第一节 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9
第二节 重译动因研究的视角	11
第三节 重译动因研究的方法论与框架	26
第四节 小结	34
第三章 重译动因研究视角的基本要素	35
第一节 赞助人视角的基本要素	35
第二节 译者视角的基本要素	48
第三节 前译面目视角的基本要素	55
第四节 小结	60
第四章 《老人与海》的重译动因研究	61
第一节 重译动因视角下的历史研究	62
第二节 重译动因视角下的文本研究	79
第三节 小结	230
结 语	235
参考文献	241

第一章 重译术语的演变与辨析

第一节 国内重译术语的演变与辨析

重译现象纷繁复杂，重译的术语界定与使用远未走上统一、规范的道路，因此笔者拟从重译术语及其使用的演变谈起，明确本研究中术语使用的规范。

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重译”有复译、对旧译较大程度的润色修订和转译三层含义^①。在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对“重译”有如下的解释：

1. 亦称“复译”，通常指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以后出版者为“重译”。2. 译者自己对旧译在较大程度上的润色修订，……3. 指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即以第三国语言（特别是英语）为中介的翻译。^②

“重译”一词的用法与含义在中国翻译史上经历了重重演变，既曾用来指译员，也曾与转译、复译混用。

在佛经翻译中，“重译”频频出现。“重译”最早见于《尚书》，

① 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② 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书中记载了夏朝末期以来的“重译来朝”一事，后《尚书大传》中又有关于“国有越裳氏重译而来”“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重译而朝”的记载^①。这里的重译，有多重翻译之意，主要针对当时的口译而言。“重译”一词在东汉至隋朝，还曾用来指“译使”，即译员，如马祖毅^②所引“南徼外国重译贡献”一句中的“重译”，记载的便是东汉灵帝时期熹平二年十二月译使的传译情况。到了宋代赞宁的“六例”中，所谓的“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中的“重译”，则指佛经通过其他外国语言的参与而出现的“累累而译”的现象，是相对于未经任何辗转翻译、由源语直达目的语的“直译”而言的^③，对此，王宏印^④给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他说，“宋代赞宁的‘六例’中提及的‘重译’，是与直接译自印度梵语的‘直译’相对应的概念，实际指的是未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译自胡语的佛经的转译。”

到了现代，重译的含义与使用仍未固定下来。邹韬奋在1920年6月4日《时事新报》上谈到，“重译……于精力上太不讲经济之道”^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关于重译价值的论战。鲁迅力主应提倡重译，虽在观点上针锋相对，却使用了“复译”一词，来表示邹文所指的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进行翻译的“重译”行为，这一点从他那篇著名的提倡不同译本相互争鸣的《非有复译不可》^⑥一文中便可获知。在该文中，他将“取旧译长处，再加上自己的

① 《尚书》，《尚书大传》，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③ 同上，第169-170页。

④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⑤ 邹韬奋：《致李石岑》，《时事新报》（通讯栏），1920年6月4日，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35页。

⑥ 鲁迅：《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6卷，第275-276页，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新心得”而产生的新译本称为“复译本”。“重译”一词也被鲁迅使用过，只是另有含义。在《论重译》^①一文中，他说道，“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出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可见，这里鲁迅口中的重译，实指转译。重译与复译在鲁迅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有趣的是，鲁迅这一以复译指不同译者不同翻译的做法，虽影响了后世至今的几代学者，却未得到同时代与其辩争，或与其契合的学者的一致追随。周作人曾对“重译书”与“重出书”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过区分^②，这里的重译，大致相当于鲁迅所谓的复译，但更接近于皮姆（Anthony Pym）^③重译研究中的“主动重译”，“重出书”则对应于“被动重译”的概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翻译标准的论战中，郑振铎在“重译问题”专论中的“重译”^④，与鲁迅的“重译”一词所指相同，均表转译，对此现象，梁实秋直接用“转译”一词，季羨林也沿用了“转译”一词，如“当然除了俗语和混合梵文以外，还有许多经是从中亚古代语言里转译过来的”^⑤。茅盾在驳斥邹韬奋重译“不经济”的论调时，使用了“复译”一词，强调“复译是必要的救济”^⑥。

① 鲁迅：《论重译》，《花边文学》，1934年6月27日，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② 周作人：《重译书》，《亦报》，1950年4月2日，转引自王向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③ 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p. 82-83.

④ 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10日，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1-192页。

⑤ 季羨林：《论梵文t.d的音译》，《中印文化关系史》，弥勒出版社，1984年，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⑥ 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新2卷第5期，1937年1月16日，转引自王向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郭沫若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一文中提到我们的翻译家“拟译一种著作”时，便“要求他人勿得重译”^①，显然，郭文中的“重译”，便是鲁迅所言的“复译”。郁达夫在《语及翻译》中谈及的“务取直接译而不取重译”一语中^②，“重译”指转译。重译、复译、转译，术语使用的混乱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从佛经翻译时期阐发译论时起，一直到鲁迅时代对重译的价值进行辩论之时，中国僧人、佛经翻译家与理论家、文学家、文学翻译学者、文学翻译家，且不论不同时代术语的统一问题，就算在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对话中，都未在同一平台的对话与辩论中实现术语的统一，这为延续至今的术语统一与规范问题种下了根由。半个多世纪后，鲁迅那一时代采用不同术语却能在同一语境进行论争的情形，在《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中再次重演了。这次大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学者，非许渊冲与许钧莫属。许渊冲将不同译者翻译同一作品的现象称为“重译”，他在解释选用这一术语的缘由时说道，“‘重译’有两个意思：一是自己译过的作品，重新再译一次；二是别人译过的作品，自己重复再译一遍，这也可以叫作‘复译’，但我已经用惯了‘重译’二字，所以就不改了”^③。罗新璋、郝运与赵瑞蕪同样使用了“重译”的表达。罗新璋认为，“《红与黑》的讨论，以评论来推动翻译，有了重译，才有比较”^④，充分肯定了重译的积极意义；郝运曾在罗玉君翻译《红与黑》时，担任编辑，发现罗译本中有些“错误和欠妥”之处，因此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重译”^⑤，道出了重译

① 郭沫若：《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6月，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

② 郁达夫：《语及翻译》，《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436页，转引同上，第225页。

③ 许渊冲：《谈重译——兼评许钧》，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④ 罗新璋：《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六）——罗新璋致许钧》，同上，第50页。

⑤ 郝运：《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四）——郝运致许钧》，同上，第43页。

的价值与动因问题；赵瑞蕤认为“古今中外名著重译多得很”，“名著不厌百回译”^①，揭示了重译的必要性。而在另一方，许钧自始至终都采用“复译”一词。也有不加区分，将复译与重译混用的学者，如施康强提倡“名著重译，何妨各行其道”^②，使用了“重译”一语，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选择了“复译”一词，表达了“窃以为复译之道，当不求其同而自同，不求其异而自异”^③的看法。

重译与复译的交织更替，俨然将学者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主张将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翻译的行为称为“复译”的学者，常赋予“重译”一词以转译或修订自我译本之意。马祖毅在《中国翻译史》^④一书中论及契诃夫作品的翻译，称其“最早是吴棹根据日本的译文重译的”，这里的重译即指转译。郭著章等在《翻译名家研究》^⑤一书中记述巴金的文学翻译历程时，称巴金自己修订译本的行为为“重译”工作。采用“复译”的学者还有郑海凌^⑥、姜秋霞^⑦、李明^⑧、陆颖^⑨等。另一阵营的学者则惯用重译一词。王宏印^⑩认为，所谓的重译，指“同一作品的重新翻译”。王宏

① 赵瑞蕤：《关于〈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② 施康强：《红烧头尾》，同上，第3页。

③ 施康强：《何妨各行其道》，同上，第118页。

④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34页。

⑤ 郭著章等编著：《翻译名家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⑥ 郑海凌：《论“复译”》，《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4期。

⑦ 姜秋霞：《心理同构与美的共识——兼谈文学作品复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1期。

⑧ 李明：《从主体间性理论看文学作品的复译》，《外国语》，2006年第4期。

⑨ 陆颖：《描述翻译研究视域下复译“贵在超越”论的内在悖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3期。

⑩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印^①在《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中使用“重译”一词，并认为，经典重译“实际上是在‘有定’和‘无定’之间循环往复不断进取的过程”，“也是翻译经典化（canonization）的过程”。同样采用“重译”术语指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进行重新翻译行为的学者还有陈国华^②、孙致礼与周晔^③、刘晓丽^④、罗国林^⑤等。当然，在重译与复译之间，也存在将二者混用的情况。赵稀方在其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中，未对“重译”与“复译”两个术语做出明确的界定与区分，在论述中基本是二者进行替换使用，例如在谈到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王尔德作品的翻译时，分别使用了“新时期以来就已经有四种复译”和“王尔德后来出现了很多复译”的词句，而在提及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和司汤达作品的翻译时，又换作“八十年代初就得到众多的重译”和“新时期经典名家重译之多”的表达^⑥。同样，查明建和谢天振^⑦两位学者在《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一书中，在表达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进行重新翻译时，也未加区分地交替使用了“重译”与“复译”两个术语。

第二节 国外重译术语的演变与辨析

相对于国内重译术语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界定与辨析，国外对重译（retranslation）的界定显得较为简明。

①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② 陈国华：《论莎剧重译》，《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孙致礼、周晔：《交织在叙述语言中的战争与爱情——海明威〈永别了，武器〉重译有感》，《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④ 刘晓丽：《名著重译 贵在超越》，《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

⑤ 罗国林：《名著重译刍议》，《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

⑥ 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⑦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国外翻译界中重译 (retranslation) 一词一般而言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一是与我国翻译学者所谓的转译类似的“非直接翻译”, 二是指不同译者对同一原著的不同翻译, 这与国内有些学者采用的“重译”概念相吻合。

夏特尔沃斯和考伊 (Shuttleworth & Cowie) 编撰的《翻译学词典》将重译等同于间接翻译 (indirect translation), 即“非直接译自原文, 而是译自另一种语言的居间译本”。这与《内罗毕建议书》(Nairobi Recommendation) 中对“retranslation”的描述基本一致。即建议书将翻译的原则定为从原作直接译出, 而与之相对的并非直接译自原作的翻译, 则被冠以“重译”一词。^①

威廉姆斯 (Jenny Williams) 与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将重译定义为“某一文本被再次翻译到同一目的语的情形” (retranslation, where a given text is translated again into the same target language)^②。

在贝克 (Mona Baker) 和萨达纳 (Gabriela Saldanha) 编写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中, 他们认为重译 (retranslation) 主要指将此前曾译入同一语言的同一作品再次进行翻译的行为, 或者指由这一行为产生的结果, 如被重新翻译的文本本身。他们也提及夏特尔沃斯和考伊以及甘比尔 (Gambier) 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4 年对“重译”所下的定义, 即“间接的” (indirect), “中转的” (intermediate) 或者“接力” (RELAY) 翻译, 如通过另一种中转语言翻译得来的文本^③。

① 田传茂:《西方重译理论研究述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② Jenny Williams & Andrew Chesterman,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 71.

③ Mona Baker & Gabriela Saldanha,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pp. 233.

第三节 小结

从国内外学者对“重译”术语的界定以及“重译”术语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重译与转译、复译等术语在内涵上出现了诸多重合之处，在使用上也出现了交替更迭的复杂过程，其中，转译并非本研究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集中辨析重译与复译的术语使用问题。为了对两种术语在当今译坛的实际使用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翔实、直观的把握，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数据统计。在“主题”一栏中，以“复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年代不限，共查找到185篇相关论文，而若以“重译”为关键词，年代不限，则出现了415篇论文之多，其中，在郑诗鼎的《评刘重德的〈爱玛〉重译版本》^①、张经浩的《重译〈爱玛〉有感》^②和杨自俭的《关于重译〈印度之行〉的几个问题》^③的三篇文章中，“重译”一词特指译者对自己的译作做出的程度较大的润色修改，因此若将这三篇文章除外，知网上发表的所有论文中，仍有412篇使用“重译”一词，表达不同译者对同一著作的翻译之意，其数量大大超过使用“复译”这一术语的论文。当然，单纯的数量并不能说明“重译”这一术语更为权威，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其使用的广度与在译学研究中的普及度。也正是主要鉴于此，笔者将本研究的主题，即不同译者对同一经典名著的重新翻译，冠之以“重译”一词。

“重译”的术语辨析与界定已经明确。在下文中，我们将确定本书在重译研究中的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研究框架。

① 郑诗鼎，《评刘重德的〈爱玛〉重译版本》，《中国翻译》，1998年第1期。

② 张经浩，《重译〈爱玛〉有感》，《中国翻译》，1999年第3期。

③ 杨自俭，《关于重译〈印度之行〉的几个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5期。

第二章 重译动因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一节 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国内的重译研究走到今天，在问题论争式的发展模式中稳步前行，由起初论争中相对集中的研究趋势，逐步过渡到当前各自为营、迷失大方向的情形，正如吕俊、侯向群对当前译学研究所做出的整体上缺乏一种“大的方向与趋势”、呈现出零乱意义上的“多元性”、陷入“低迷与徘徊”的论断一样，重译研究似乎也难逃这一“零乱意义上多元性”的状态^①。一方面，在一些各自为营的重译研究中，即便涉及个案研究，也难有选取恰当的视角，从理论框架的构建开始，将个案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将重译现象连贯起来进行整体的、详细的、历史性叙述的研究^②；另一方面，在有些从整体上研究重译的专著中，虽有对重译历史角度的关照，但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中纷繁而庞杂，著者自己并无明确的理论视角，也无暇将各种本不相容的理论整合成面目清爽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实际的案例或解决现实的问题。

① 吕俊、侯向群：《翻译批评学引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2-221页。

②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162.